

坚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战略擘画与实践升华

■郭庆松

改革开放排头兵在习近平上海足迹中孕育

一个城市发展的成效如何,决定于这个城市的战略定位是否准确。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对上海的说法就是“有前途,要发展”,1990年邓小平的说法是“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如果说国际大都市是基于国际视野的有关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排头兵则是基于国内视角的有关上海发展的战略要求。循着习近平上海足迹,上海发展的这一战略要求逐步清晰。

种感情深度融化在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热切期盼,转化为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战略嘱托。

2007年3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一上任就到浦东调研并明确要求,要继续发挥好浦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特别是要深刻认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

翻开《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这本书,从党的建设到城市建设,从城市战略定位到城市精神提炼,从抓发展、惠民到凝共识、聚人气等,无不体现习近平同志对于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战略擘画。

态度,大气谦和是一种胸襟,这样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进一步追求卓越。”上海城市精神已经深深印刻在“排头兵”行进的轨迹之中。

改革开放排头兵在习近平指导上海实践中升华

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在习近平上海足迹中孕育,也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上海实践中升华,并不断具象化为打造开放新高地、创新发展新奇迹的上海故事、上海经验。

201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要求:今后五年,上海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要求之一:加快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成为全国各地谋划自身发展的基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题也大多涉及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话题并成为上海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指针。

2018年11月,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希望

上海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的骨头,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9年11月考察上海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破除共产主义认知上的历史目的论——

破解时代难题 承担时代使命

■李海青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彻底破除共产主义认知上的历史目的论思维,在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同时,以自身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致力于现实的变革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历史的目的论理解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思维。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的历史目的论解读极大扭曲了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观。

一方面,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确实是共产党人矢志不移、接续奋斗的目标。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我们党的领袖都有非常明确的论述。

但另一个方面也要看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当下的奋斗与生活又不能仅仅由最终的理想目标来赋予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力的解放发展,注重人的权益保障与共同富裕,注重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开创形成并持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制定新的目标蓝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

破解时代性问题的时代性探索

换言之,破解时代性问题的时代性探索必然具有时代性意义。这种时代性的探索与进步当然会成为未来理想社会实现的阶段性基础,但其决不仅仅助力未来理想的实现而具有意义。

国比附的认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未来,同样关注当下,既反对共产主义的虚无缥缈论,也反对将现实仅仅作为未来的工具与手段的历史发展的目的论。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并没有神秘力量预先确定的最终目标和终极目的。恩格斯在与法国费加罗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

（作者为中共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把握好“四个度”

■张坤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

近年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治理边界逐渐扩大,治理难度不断增加,治理紧迫性不断增强。

一要着眼“高度”。近年来,国家和有关省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和实施方案,但就各地的具体落实情况看,进展并不平衡。

二要聚焦“深度”。当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首先要深度布局。要基于5G云网一体的数字基础设施,打造万物互联、融合感知、实时认知、自动决策、跨域协同的城市大探索。

外,积极为企业提供便捷化、智能化、精准化服务,减少企业在业务办理上的时间,优化营商环境。再者,要深度开放。目前“数据孤岛”问题仍然存在,要继续打破数据壁垒,激活沉睡的数据要素价值。

三要秉持“法治度”。技术创新既包含机遇,也蕴含风险。要推动技术向“善”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要加速完善数字法治体系建设,大力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建立健全数据权利体系,有效破解网络黑灰产的法律规制、数据财产的确权、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数字经济司法难题。

四要确保“温度”。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有速度,还要有温度,让更多人可感、可知、可及,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是要坚持“民生优先”。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改革,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促进城乡“政府大脑”与“社区微脑”的互通互联,推进公共服务机构数字化转型。

准确把握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

应该看到,这种对于共产主义